

## 批判与建构: 异化理论批判和唯物史观 形成的逻辑理路<sup>〔\*〕</sup>

○ 张 迪, 刘建军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异化理论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的重要途径, 精神异化批判、异化劳动批判和宗教异化批判分别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的哲学基础、经济学基础和实践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理路与异化理论批判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关键词〕异化理论批判; 唯物史观; 逻辑理路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7.06.014

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 是指主体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自身的活动而产生自己的对立面, 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来反对主体自身。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研究既不同于黑格尔将异化的主体看作是神秘的绝对精神, 也不同于费尔巴哈仅将宗教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观点。他主要是通过黑格尔精神异化理论的批判、对异化劳动理论的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宗教异化理论的批判, 提出了实践的观点是唯物史观最基本、最首要的观点。历史表明, 正是马克思通过对精神异化的批判、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和对宗教异化的批判, 进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逻辑理路。

### 一、批判精神异化, 建构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 “德国的批判, 直至它最近所作的

---

作者简介: 张迪(1990—),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建军(1963—),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 2016 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资助计划成果。

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试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经超出了黑格尔哲学。”<sup>[1]</sup>在马克思青年时期,虽然黑格尔学派已处于解体的过程中,但是它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并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德国的思想界。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施特劳斯和布·鲍威尔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之间的争论虽然十分激烈,但归根到底没有越出黑格尔哲学的基地。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成了他唯物史观形成的重要契机。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法哲学思想,即颠倒现实关系的思辨唯心主义体系。在黑格尔那里,国家不是现实社会的规定,而是绝对观念的体现,比如在《法哲学原理》中,他指出:“现实的理念,即精神,把自己分为自己概念的两个理想性的领域,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性的现实精神。”<sup>[2]</sup>从逻辑排列上看,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放在国家之前,但这只是现象和经验之间的关系,本质关系则是家庭和市民社会没有独立性,国家是它们追求的目的,它们是从属于国家的。由此看来,黑格尔不是从政治和社会的经验事实出发引申出法哲学的基本概念,而是把这些基本概念看作是逻辑理念自身运动的产物。他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看作是理念自身运动、自我展开的环节,为此,马克思批评道:“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像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sup>[3]</sup>马克思发现,黑格尔法哲学的真正注意中心并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不是事物本身的发展逻辑,而是逻辑范畴运动中作为环节的所谓“事物”。由于这种主词和谓词、现实和观念关系的“头足倒置”,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真实的关系便完全被神秘化了。黑格尔这种颠倒主体和客体关系的观点马克思称之为“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sup>[4]</sup>。马克思以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神秘主义进行了剖析,他指出神秘主义的奥秘在于颠倒理念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以逻辑代替现实,现实世界要服从逻辑推理。可以说,黑格尔的逻辑“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sup>[5]</sup>“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sup>[6]</sup>与黑格尔的观点相反,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sup>[7]</sup>如果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政治国家就不可能存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神秘主义

的批判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决定性出发点。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揭露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秘密。马克思认为思辨唯心主义的秘密就在于把概念独立化、实体化,既把本来是个别的事物抽象出来的一般当作独立存在的本质,又把它当作独立事物的创造者,而客观具体的事物只是一般这个独立存在的本质的简单存在形式。他指出:“黑格尔的历史观以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为前提……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也就变成了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sup>[8]</sup>从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理论出发,历史就成了少数伟大人物的活动场所,而群众则成了精神运动的消极的旁观者。可见,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在本质上是“用黑格尔的形式来重谈基督教的创世说”<sup>[9]</sup>。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宣扬“自我意识”的哲学或“批判哲学”的目的就是要把一切外部感性的斗争都变成纯粹观念的斗争。针对鲍威尔等人把历史发展归结为“自我意识”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sup>[10]</sup>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生产也总是以客观条件为前提的。“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sup>[11]</sup>

其次,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关于精神异化的思想。《精神现象学》一书关于“精神”的分析中,黑格尔深入地讨论了精神的异化问题。在他看来,意识表现为各种各样,比如,“苦恼的意识”表明自我意识的这种普遍效准就是从自我意识异化而成的实在性;“高贵的意识”认定国家权力和财富与自己是同一的,因而要百依百顺地听从国家权力驱使,愿意为维护并发展公共权力而奋斗;“卑贱的意识”认定国家权力和财富与自己是不同一的,甚至是敌对的,它视国家的统治力量为压迫和束缚自己的锁链,因而仇视统治者,随时可以暴动;“分裂的意识”则是对其自己的概念有所意识了的精神,是现实和思想的绝对而又普遍的颠倒和异化。<sup>[12]</sup>黑格尔的这一思想蕴含着一个深刻的见解,即形形色色的思想意识都只不过是精神异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简言之,意识本身就是异化的产物。

人们创造了各种意识,意识渐渐地独立化并神秘化为一种统治人的精神力量。于是,人们跪倒在自己所创造的意识面前顶礼膜拜。黑格尔的这一思想是具有深刻的批判因素的,但是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在《现象学》中出现的异化的各种不同形式,不过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sup>[13]</sup>“它们是思想本质,因而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sup>[14]</sup>这样一来,遭到批判并被扬弃了的各种意识实际上在“绝对知识”中又得到了肯定和恢复,本来应该具有批判精神的黑格尔哲学本身也成了容纳一切的意识形态,成了精神异化的一种典型形式。

最后,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异化思想,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

一是批判的目光不应该停留在天国,而应该投向尘世。马克思的《论犹太人

问题》主要是针对布·鲍威尔用迷信说明历史的观点进行批判的,他把犹太人的解放问题看作是一个单纯的宗教问题,认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是犹太人政治解放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的解放并不是鲍威尔所认为的,必须先从犹太教中解放出来,才能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因为,即便是“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仅存在,而且是生机勃勃、富有生命力的存在。”<sup>[15]</sup> 马克思驳斥了这一试图用迷信来说明历史的谬误观点。这表明,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从宗教中获得解放的问题,而是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问题。诚然,马克思也承认,“宗教的定在是一种有缺陷的定在,那么这种缺陷的根源只能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sup>[16]</sup> 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把已被布·鲍威尔颠倒了的问题又重新颠倒过来了。

二是批判观念的东西、意识的东西支配着现实世界的思想。马克思认为,犹太人的秘密不是在宗教中,而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现实中的犹太人把从事工业和商业赚钱作为一切活动的目的,钱是他们世俗的上帝。“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却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sup>[17]</sup> 如果说,钱是人们在劳动和交换的过程中必然异化出来并统治人的“外在本质”的话,那么,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则是人的本质异化的结果。“在所谓基督教国家中,实际上起作用的是异化,而不是人。”<sup>[18]</sup> 在这样的国家里,“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sup>[19]</sup> 如何扬弃这类异化现象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有一种社会组织消除了经商牟利的前提,从而消除经商牟利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社会组织也就会使犹太人不可能存在。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淡淡的烟雾一样,在社会这一现实的、生命所需的空气中自行消失。”<sup>[20]</sup> 由此可以看出,是现实世界支配着观念的东西,而不是相反。现实世界不过是从观念的东西异化出去的精神的存在物。从这些重要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穿破了异化造成的种种雾障,看到了唯物史观的现实基础。

三是批判“把一切外在的感性的斗争都转变成纯粹的思想斗争”<sup>[21]</sup> 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反对任何现实的斗争,反对任何群众的运动,把“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sup>[22]</sup>。实际上,任何外在的感性斗争都不是为了某种纯粹的思想,而是为了实际物质利益,“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胜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sup>[23]</sup>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sup>[24]</sup> “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sup>[25]</sup> 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异化理论的批判,是他形成唯物史观的重要触媒。

## 二、批判异化劳动,建构唯物史观的经济学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从私有制的运动似乎使人民富有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替私有制辩护的结论”<sup>[26]</sup>。虽然国民经济学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启发,但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sup>[27]</sup>“我们且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sup>[28]</sup>如此等等。国民经济学是一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sup>[29]</sup>它提倡的道德是谋生、劳动、节约和克制,对于它来说,甚至连人的存在都是十足的奢侈。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既未揭示劳动的异化本质,也未对私有财产采取历史的批判的态度,经济学家强调,“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sup>[30]</sup>,但他们未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针对国民经济学的局限性,马克思从全新的角度深化了整个批判运动。如果把国民经济学视为对资产阶级的辩护,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由于马克思把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即异化劳动的事实。

首先,批判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的基本的现象。异化劳动表现为劳动者同劳动产品、劳动者同劳动过程的异化,也表现为人与人、人与人的类本质之间关系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劳动者所创造的一切都作为异己的力量倒过来压抑、统治劳动者本身。然而,在马克思看来,不仅劳动是现实的,而且异化和异化劳动也都是现实的。同时,他指出:“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sup>[31]</sup>正是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异己的、与自己敌对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也生产出异己的类本质及与他人之间冷漠的、甚至敌对的关系。马克思还认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sup>[32]</sup>,而私有财产则不过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sup>[33]</sup>。他还指出:“正像路德把信仰看成是宗教的外部世界的本质,因而起来反对大主教宗教一样,正像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人的内在本质,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笃诚一样,正像他把僧侣移入世俗人心中,因而否定了在世俗人之外存在的僧侣一样,由于私有财产体现在人本身中,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在人之外存在的并且不依赖于人的……财富被扬弃了,换言之,财富的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就被扬弃了。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sup>[34]</sup>

其次,批判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以配第、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

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之一,他们虽然指出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基础,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他们并没有区别具有二重表现的劳动的二重性质。而马克思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根本矛盾的批判,从中剥离出了劳动范畴,说明要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于对劳动范畴的理解。他指出:“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下的耗费……它生产使用价值。”<sup>[35]</sup>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终原因;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sup>[36]</sup>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研究劳动范畴对解决劳动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最后,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合理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种的整体特征、种的类特征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征。”<sup>[37]</sup>由此看来,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观点的研究,得出了劳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而人的类特征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从而把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大大推动了一步。这同时也说明了劳动按其本性来讲应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在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后逐渐的被异化以致最后人本身也被异化了。因此,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则是一种异化劳动,并不是古典经济学所讲的“一般劳动”。

总之,我们所看到的劳动就不再是康德那神秘的“自在之物”,也不是黑格尔那充当“至上神”的“绝对精神”,而是一系列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范畴体系。正如达密柯指出的,对马克思来说,劳动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哲学概念,即马克思把“劳动”主要地看作人的生命活动和主体的对象化,看作一种人类活动的基本理论或社会生活本体论的组成部分。<sup>[38]</sup>在马克思看来,扬弃私有财产也就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一理论为唯物史观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学基础。

### 三、批判宗教异化,建构唯物史观的实践基础

正如马克思所评论的:“只有费尔巴哈才立足于黑格尔的观点之上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体系,因为费尔巴哈消解了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使之变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因为他同时也为批判黑格尔的思辨以及全部形而上学拟定了博大恢宏、堪称典范的纲要。”<sup>[39]</sup>然而,由于费尔巴哈片面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不了解实践活动,他的实证的批判仍然是

软弱无力的,归根到底,他仍然是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理论的俘虏。因此,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批判,主要是围绕宗教异化问题展开的。

首先,批判费尔巴哈把世界解释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的观点。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把基督教作为世俗世界的基础,但他却不能解释世俗世界本身,即他不理解世俗世界之所以异化为一个宗教世界,是因为这个世俗世界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而他不知道这个世俗世界的矛盾。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评的:“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sup>[40]</sup>也就是说,克服宗教弊端的根本途径就应当通过革命的实践来改造社会关系,使现实的世俗世界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且在实践中得到改造。正如奥古斯特·科尔纽所指出的:“由于他(指费尔巴哈——引者)未能看到宗教的幻想不过是现存社会的深刻分裂,即是意识形态上的颠倒,所以认为消除了宗教的幻想,也就揭示了这种幻想的人的基础。而实际上,应当消除的是产生这种幻想的社会关系,只有革命的实践才能摧毁这种社会关系(第四条提纲)。”<sup>[41]</sup>由此可以看出,正是费尔巴哈的止步不前,从而体现出他的哲学思想的不彻底性。

其次,批判费尔巴哈人的本质是宗教异化的观点。如何看待人的本质?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个体和类。他认为:“如果不把类看作类,那就必定把它看作上帝。”<sup>[42]</sup>由此可以看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sup>[43]</sup>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孤立的——人的个体。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sup>[44]</sup>与此相反,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本质体现在人们活动的社会关系中,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45]</sup>事实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写道:“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時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sup>[46]</sup>由此可见,即使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整体上仍然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但他的许多观点早已超出了费尔巴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sup>[47]</sup>在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已经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的影响。

最后,批判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活动理解为“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

式”的观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48]</sup>“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sup>[49]</sup>在这里,马克思与机械唯物主义不同,他并不把观念还原为感觉,而是通过观念向实践的归结,揭示出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根源。此外,马克思驳斥了费尔巴哈轻视人的实践活动,认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sup>[50]</sup>,肯定了实践是检验一切思想意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标准。马克思还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51]</sup>把实践作为自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与各种各样的旧哲学划清了界限。

总之,从马克思所从事的上述异化理论批判活动中可以看出,异化问题始终是马克思思考和研究的中心问题。正是通过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精神异化、国民经济学家所竭力掩盖的异化劳动和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逐步形成。三者之间是一种有机的互动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精神异化批判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的世界观基础,异化劳动批判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的方法论基础,宗教异化批判则是精神异化批判和异化劳动批判理论成果及方法论的进一步运用,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

### 注释:

[1][8][9][10][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7][28][29][30][31][32][33][34][36][37][39][40][43][44][45][46][47][48][49][50][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4、291—292、305、295、204、203、27、27、52、36、163、49、288、293、287、286、158、156、166、176、165、167、186、178—179、155、162、342、500、501、501、501、188、530、501、499、500、502页。

[2][3][4][5][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49、250—251、250、263、252、251页。

[11][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8、42页。

[12]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页。

[38]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41][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王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4页。

[42]《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58年,第193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